

2017年 第3辑


Educational History Studies

# 教育史研究

周谷城题



《教育史研究》编辑部◎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 教育史研究

JIAOYUSHI YANJIU

2017年  
第③辑

《教育史研究》编辑部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本书封四贴有含人民教育出版社注册商标的标识，无此标识者视为盗版图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史研究. 2017年. 第3辑 / 《教育史研究》编辑部编.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107-32215-0

I. ①教… II. ①邓… III. ①教育史—研究—世界 IV. ①G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1440 号

### 教育史研究 二〇一七年第三辑

---

出版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100081）

网 址 <http://www.pe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 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42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采用任何方式擅自复制或使  
用本产品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如发现内容质量问题、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电话：400-810-5788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人民教育出版社  
编辑出版

山西师范大学  
协办

编委会主任 郭 戈  
编委会副主任 张斌贤 邓友超 刘立德  
卫建国 薛耀文 储朝晖

主 编 邓友超 刘立德  
执行主编 姚宏杰 韩红升

常务副主编 徐卫红 韩华球  
副 主 编 万作芳 刘 捷  
冯卫斌 于 珍

编辑部主任 徐卫红 韩红升

英文编辑 程 军  
封面设计 于 艳

1989年创办

每年四辑

---

【特稿】

滕 纯口述 姚宏杰整理 关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建所前后的回忆/1

【教育史学】

韩红升 美德意境中传统教育智慧的文化解读  
——关于“什么是教育”的中国式回答/14

赵国权 两宋女子教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重构/39

【中国近现代教育史】

张建军 清代蒙旗教育教材的出版与使用情况初探/51

尚大鹏 明治后期日本体育会体操学校的中国体育留学生/70

杨齐福 咸与维新：清末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编撰述论/81

秦玉清 中国最早的新式课本《最新国文教科书》研究/92

李 娟 试论中国近代小学科学课程概念的变迁/105

储朝晖 中国现代教育社团的萌生及其动力/115

喻本伐 陶行知自存“家谱”研究/184

徐卫红 陶行知教育观念的一种行走

——作为教育家的戴自俺/201

## 【中国当代教育史】

丁兆君 陈崇斌 丁毅信 南迁后，谁主沉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归口、体制与办学方向的  
变迁/227

## 【纪念·回忆】

邰忠民 谈谈民生教育思想的来源和内涵

——纪念我的父亲邰爽秋诞辰一百二十周年/238

刘 齐 民生教育：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石

——纪念邰爽秋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247

# 关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建所前后的回忆\*

滕 纯 口述 姚宏杰 整理

关于中央教科所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从筹备到成立，“文革”以前的那一段，现在知情的人不多了。所内健在的有我、金世柏，所外的有吴式颖、刘英杰、连健生、张守智等，也都是九十岁上下的老人，年事已高了。因此，回忆、整理那一段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带有抢救性质的。我会尽我所知，把我了解的告诉你，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尽可能提供一些线索，以便进一步去查证核实。

## 中央教科所的源头

中央教科所的建所历史原来是从1957年算起的，2007年搞了五十年所庆。为什么后来2011年又搞七十年所庆？因为寻找到了中央教科所建所的第一个源头。

早在延安时期，1941年党中央成立了中央研究院，院长是张闻天。中央研究院下面有一个中国教育研究室，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担任教育研究室主任。现在回想起来，中央教科所的老领导董纯才<sup>①</sup>、张健<sup>②</sup>他们为什么一直关心中央教科所的历史由来，就和这段历史有关系。1941年的时候，董老、张老在延安都是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的成员。从中国共产党建立教育研究机构的历史来看，延安时期的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应该是中央教科所的前身，是最早的源头。

近年来我又在思考，还可能有第二个前身应该续上。第二个前身是什么？我们党中央从延安到西柏坡到搬到北京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央宣传部

---

\* 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6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一般项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创办史实考源”（GYC2016010）的阶段成果。滕纯，1929年生，河北宁河人。曾任哈尔滨市教育局中学视导员，教育行政学院教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教育理论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教育科学出版社社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会副理事长。1996年离休。现任教育学会学术顾问。本文根据滕老2017年3月1日、3月8日、6月29日三次谈话整理而成，经本人审定。

① 董纯才（1905—1990），湖北大冶人。1949年后长期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1978—1983年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兼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② 张健（1919—2011），安徽肥东人。1983—1985年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也有个教育研究室。当时徐老（徐特立）是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兼教育研究室主任。张腾霄<sup>①</sup>是研究室的研究员，也是徐老的秘书。原来咱们所里有个曲桢森，也是位老同志，在教育部工作过。我记得他跟我说他在中宣部教育研究室里给徐老做过秘书。因此，我觉得要搞清中央教科所的源头、渊源，1941年的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是个最初的源头。2011年七十周年所庆时，已经把这段历史续上了。中宣部教育研究室应该是我们的第二个源头。这个还没有续上。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中央教科所成立之前，中宣部里有个教育研究室与在延安时期中央研究院里头有个教育研究室是一个道理。后来中宣部机构有大调整，设有文艺处、理论处、科学处、教育处等几大处，许立群是理论处的处长，于光远是科学处的处长，林默涵是文艺处的处长，程今吾是教育处的处长，陈道是教育处副处长。建国初期由徐老兼任主任的教育研究室可能就改成教育处了。中央教科所虽然直属教育部，实际上是我们党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第一个全国的中央一级的教育研究机构。从批准成立中央教科所来说，也是教育部报请中央宣传部批准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从领导体制上说，教育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等涉及意识形态的部门，都归中宣部管。虽然从行政上来讲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但是实际上是由中宣部管的，是党的统一领导的体制。教育部的请示报告首先得请示中宣部，中宣部同意了再报国务院批。所以你看教育部关于成立中央教科所的请示报告，首先是向中宣部请示的，中宣部同意之后才报国务院的，国务院同意了，再到中央编办才给你拨多少编制，这才立了户口，立了户口之后再到财政部，有个文教司，才给你拨经费。是这样的体制。

由此我还想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恢复、重建中央教科所的问题上，当时中国社科院的态度很积极。于光远已当了社科院的副院长，据王铁说，于光远让王益（社科院科研局长）带话说，如果教育部不恢复教科所，社科院就要成立教科所。这是不是与过去中宣部曾经设有教育研究室有关系呢？记得1977年，有一次我见到中宣部原教育处陈道同志，谈及中宣部教育研究室与中央教科所的事，他说当年徐老非常重视教育科学研究，年事已高还亲自抓，当然与后来成立中央教科所有关系。

为此建议，要想办法到中宣部档案室查一查。如果再续上中宣部教育研究室这个源头的话，中央教科所的历史就更完整了。

## 教育行政学院与中央教科所的密切关系

中央教科所从1956年成立了筹备处。筹备处这一段我还不是中央教科所的一员，我还

<sup>①</sup> 张腾霄（1915—2017），河南洛阳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教务部副部长、哲学系主任、校党委书记、副校长。

在教育行政学院。不过筹备处就在和平门，在教育行政学院的大院里。那时候，教育行政学院和中央教科所筹备处在业务上、学术上和生活中的来往很多，交流也很多。

1956年我从哈尔滨市教育局调到教育行政学院学习，学习一年。1957年让我留校，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车票都买好了，准备回哈尔滨。人事处找我，说学院决定要从毕业生中留下几个人留校任教，你是其中一个，征求你的意见。我说我听组织上分配决定。我就被分配到哲学教研室。我们那个教研室有几位老专家，有的是延安来的老干部，是11级、12级、13级的老同志。齐心同志曾在此任教，1956年以后调到中央党校任教去了。我是比较年轻的，16级，还有几个18级的，还有几个刚刚大学毕业，22级。我的职务是教员，相当于讲师。

留校以后，和中央教科所筹备处的人接触就多了，在一起办公，在一个大院里生活。教科所的几位研究员曹孚<sup>①</sup>、王铁<sup>②</sup>、陈元晖<sup>③</sup>常给教育行政学院讲课。当时教育行政学院还办个研究生班，有苏联专家讲课，她的名字好长，叫安娜·斯塔西里耶夫娜，是列宁格勒教育学院的一个教授。那时候我既听教育行政学院讲课，也上研究生班里听课，参加习明纳尔（seminar），就是课堂讨论。教科所举办什么活动，我也常去听。那个时候在教育部系统里头，这种交流还是比较多的，可以自由参加的，没有什么壁垒。比方说1957年中央教科所办的纪念夸美纽斯三百周年的活动，我知道后就去参加了。特别是1957年凯洛夫<sup>④</sup>访华，我也去听报告了，是在北京饭店二楼大会议厅，凯洛夫讲演，金世柏做翻译。人家说你是哲学研究室的怎么也来听，我说我从1947年、1948年在东北就学过凯洛夫教育学。

教育行政学院停办是康生宣布的。1960年7月份，都放暑假了，忽然有紧急通知，在院的教职工都参加。去了之后才知道是康生来做报告。董老也来了，他说滕纯你做记录。康生开头讲了很多当前的教育革命形势怎么怎么样，最后宣布经过中央文教小组、中宣部同意，教育行政学院解散。他宣布这件事时，董老坐在那里，脸色阴沉。因为教育行政学

<sup>①</sup> 曹孚（1911—1968），江苏宝山（今上海市宝山区）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育学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sup>②</sup> 王铁（1918—1999），河北容城人。1937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教育部中教司中学处副处长、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编辑室主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78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重建，任领导小组成员，并曾担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会常委、教育科学分支主编等。

<sup>③</sup> 陈元晖（1913—1995），福建福清人。曾任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系主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教育编辑室主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暨教育学会分会代理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sup>④</sup> 凯洛夫（1893—1978），苏联教育家，他任总主编的《教育学》一书曾对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中国教育界产生过巨大影响。1956年末至1957年初，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邀请，凯洛夫率团访华。

院是他主持操办的，付诸心血的。当时做完记录就收上去了。因为要做记录，你得仔细听，所以回忆康生当时讲了什么话，可能比别人记得多一点。康生讲现在各地都在搞教育革命，你们还办学院，把校长们、局长们都集中到北京来坐而论道，严重脱离实际，不符合当前形势的要求，所以宣布解散。至于你们人员的去留，教育部有安排。

不久，教育部人事处来人了，找大家谈话，说有几个去向：一个是要下放，充实基层。有到新疆的，有到西藏的，还有到宁夏以及其他地方的。下放到北京市的也有，有的到中学当支部书记的，有的到对面北师大附中当校长的。当时教育部还办了一个外国语学校，分到外国语学校去的不少，还有一个语言大学，也调去不少。最后宣布，有一部分要调到中央教科所，记得有14个人。其中有教育行政学院教务长任时，有教育学研究室的刘英杰、胡克英、周鸿志、张燕镜，有教育心理研究室的伍棠棣、张昉，有教育史研究室的张安国，有哲学研究室的滕纯，还有图书馆的章咸、张守智等人。

有一种说法，说中央教科所是由原来的筹备处与原来的教育行政学院合并成立的。其实这种说法未必准确。不过从其组成人员来说，原筹备处人员和原教育行政学院的人员各占一半，确系事实。我调到中央教科所教育理论组，担任助理研究员。

### 董老、戴伯韬、人教社与教科所的筹建

1953年，董纯才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董老为发展新中国人民教育事业，除了继续负责联系人民教育出版社（时任社长为叶圣陶先生）外，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抓干部培训，1955年成立教育行政学院；二是1956年就打报告申请成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57年批准。这几件事，都是教育的基本建设，要联系起来看。

日本投降后，东北局势未定。毛主席高瞻远瞩，中央派了十万干部过去，开辟东北根据地，建立东北解放区。那时候就开始接管教育，废除了伪满那一套，把苏联的教材引进来。在哈尔滨办了一个俄语专科学校，培养懂俄文的人才，培养了很多人，开始翻译教材。董纯才、蒋南翔、陈元晖、张健那时都到了东北。董纯才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任哈尔滨市教育局局长，张健也在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协助董老工作，陈元晖任哈尔滨大学副教务长、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1953年大区撤销了之后<sup>①</sup>，不少教育方面的干部调到北京来，加强教育部。

<sup>①</sup>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设华北、西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不再是一级行政机关，而作为中央机构的派出机构或代表机构。1953年前后，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均调回中央任职。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关，各大行政区委员会随同各中央局、分局一并撤销。至10月份，大区撤销的任务完成。

董纯才就从东北到了北京，担任教育部的党组书记、副部长，实际上是一把手。

当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里，除了有语文、数学、生物、化学等学科的教材编辑室，还有个教育编辑室，这也是董老和戴伯韬<sup>①</sup>的高明之处。本来教材出版就是数理化、文史哲、天地生，怎么还搞个教育编辑室，专门出教育研究特别是教育理论方面的书？这就看出来在董纯才、戴伯韬他们的思想中，对于办教育，除了那些具体的学科以外，还要有一个研究教育理论、教育规律的机构。为此，调了一批学者专家来充实人教社教育编辑室。这些专家主要有：曹孚，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教育学专家；陈元晖，心理学家，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王铁，是从老区来的教育理论专家，原来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工作；许椿生<sup>②</sup>，是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史教授；胡寄南<sup>③</sup>，是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的教授。还有十来位中青年研究人员，我记得有吴式颖、琚鑫圭、陶蔚扬、朱典馨、陈远晖、谢隆英等学有专长的研究骨干。这些学者、专家后来成了中央教科所筹备建所的“班底”。中央教科所开始筹备，就把这些人都调过来了。<sup>④</sup>董纯才是教育部党组书记，我想他的思路是这样的：要把教育办好，要出教材，就要有研究教材的人，还要有培训干部、专门研究教育的人。到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还有教育编辑室，这个教育编辑室对教育理论研究可以说是贡献良多，中外古今的教育名著可以说基本上出齐了。

当时为什么叫筹备处呢？因为成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要是学术研究人员的问题。有了机构，关键是要有人才。为此，向中央宣传部报了一个调人名单，这个名单包括刘佛年、瞿葆奎、顾明远、潘懋元、吕型伟等人。但是当时有的调来了，有的地方不放就没调来。我记得董老说过，庙里得有菩萨才行，教科所是庙，你得有菩萨，这和一般行政机构不一样。行政机构调来干部就行了，研究所要搞研究，搞研究就是要有学科带头人，有这方面学科的专家才行。这是从所的学术建设来讲。再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sup>①</sup> 戴伯韬（1907—1981），江苏丹阳人。著名教育家、出版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第一副社长，教育部党组成员，兼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负责人、所长。曾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暨教育学分会理事长。

<sup>②</sup> 许椿生（1911—1999），河北清苑人。1935年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50年调河北师范学院，1954年起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1956年参与筹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62年回河北师范学院任副教授、教授。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教育史研究》主编。

<sup>③</sup> 胡寄南（1905—1989），生于上海，1934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除短暂任职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外，长期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sup>④</sup> 1957年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正式成立时，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编辑室（1952年成立，前身为1950年成立的教育组）和教育书籍编辑室抽调部分干部组成，而遂后教育编辑室和教育书籍编辑室合并为教育编辑室。见人民教育出版社编：《甲子纪盛：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六十年大事记（1950—2010）》，内部资料，第31页。

1957年正好遇到反右派，客观上受到一些影响。拟调的人员主要是在大学里头，当时正在反右派，哪里还能给你调人？全国都在搞运动，大家都在那里揭发批判，你根本没有调人的机会。也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当时教科所就没有正式成立起来。

教科所在筹备期间（1956—1960年），除了有董老亲自抓、戴伯韬负责管之外，还有一位秘书长胡尚理主持日常具体工作。胡尚理，山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工作，曾任察哈尔省教育厅长，新中国成立后调任教育部业余教育司副司长。他为人忠厚低调，和蔼可亲，处事严谨，善于与人共事。

董老后来受到批评，批评他搞教条主义。其实今天看来这是不公正的。因为当时中央的方针是“一边倒”，学习苏联。苏联当时还是先进的，美国对我们是封锁的。凯洛夫教育学也是这样，在当时也还是先进的，不能就把它说成是教条主义的东西。是我们在学习苏联时，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学习中了教条主义。董老虽然没有被撤职，叫他去党校学习休养，实际上一直到“文革”期间再没有主持工作。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当时教育部党组成员除了有党组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学习，另外每一个党组成员还要下到所联系的基层支部。董老有时就到教科所过支部生活。那时候我还是教科所党支部的支部委员，和他在一个党小组学习生活过。

### 柳湜<sup>①</sup>与教科所

教科所成立筹备处的时候，由教育部党组成员戴伯韬负责领导。后来教育部党组分工，教科所归柳湜管。柳湜是教育部的副部长，他分管师范教育，管师资工作，管教育行政学院。我留校工作后，1958年初，当时的主管副校长肖敬若曾带着我去教育部柳湜办公室汇报工作，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柳湜。

柳湜，1928年入党，老党员，是个文化人。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他是左翼文化团体的一个负责人。在30年代的“左联”，他也是有影响的一个人。抗战以后，上海左翼联盟一些人士陆陆续续到延安。周扬去得早，当过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柳湜到延安之后，也当过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日本投降以后，柳湜从延安转战华北。北平和平解放时，柳湜是北平军管会教育组负责人，同时兼任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任教育局局长，后来调到了教育部。我记得，王铁和我说过，他也是北平军管会教育组的成员，负责去接管清华大学，后来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编辑室当主任。

柳湜在反右期间没听说有什么问题，到了1958年反右派结束以后，还有一个补漏，就是说是不是还有漏网的，北京话叫找补一下，于是他被打成了右派。记得

<sup>①</sup> 柳湜（1903—1968），湖南长沙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人民教育》总编辑、教育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1958年，有一次教育部机关召开党内17级以上党员干部开会，我也去参加了。会上宣布柳湜是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从原来行政7级降为9级，下放劳动改造。

到了1960年，中央决定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就是给右派摘掉帽子，绝大部分都摘了帽子。柳湜也摘帽了，摘帽了就恢复工作，被安置到中央教科所。咱们所里是1962年从和平门搬到教育部四楼，后来搬到红星楼，我印象大概1961年左右就知道柳湜分配到中央教科所了，担任研究员。他被分到教育理论组，组长是王铁，我们就变成同事了。他可以不上班，但组里开会他都来，一点架子也没有，和我们一块儿学习，讨论问题，组里分配给他的工作，他都积极完成。我想这和他原本就是一个文人有关，喜爱学习，喜爱讨论研究问题，喜欢跟知识分子打交道。

那还是教科所筹备处阶段，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办公地点，因在人教社办公比较拥挤，后来就把教育行政学院的大院里头的西北楼给了教科所筹备处，既办公又住宿。教育行政学院的院子很大，原来是北师大的南校。

柳湜是我们所第一任正式所长。他当所长的时候，也不是常到所里来。柳湜虽然被错误处分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在我跟他五六年的接触中，他从未流露对党的不满，也没有意志消沉过，总是希望能继续为党工作。“文革”开始后，他因为有“右派”的案底，不可避免地又被造反派揪斗。有一次，造反派找我谈话，让我写揭发柳湜是“假党员”、是“叛徒”的材料。我没有写，也不能写。我跟造反派说，我是1929年才出生的，而柳湜在我出生的前一年1928年就入党了，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假党员”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啊。弄得造反派哑口无言。之后，柳湜被“隔离审查”，受尽折磨和摧残，1968年被迫害致死。1978年后，拨乱反正，教育部召开了平反大会，为柳湜同志彻底恢复了名誉。199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柳湜教育文选》，以为永远的纪念。

## 第一次建院计划

大约是1959年，就听说要成立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消息。原来教育行政学院有个同事蔡纪良，他调到国务院二办（文教办公室）<sup>①</sup>工作，他在教育组里头。记得他和我们说过，中央教科所现在要筹备成立教科院。当时的二办主任林枫<sup>②</sup>来调研，看教

<sup>①</sup>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国务院组织法》。国务院设八个办公室，其中第二办公室主管文教，负责文化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新华通讯社、广播事业局的工作，主任林枫，副主任钱俊瑞、范长江。

<sup>②</sup> 林枫（1906—1977），黑龙江望奎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等职。

育部下面的直属事业单位机构怎么样整合，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干部要精简怎么样能更好。当时就提出成立教育科学研究院，也就是参照苏联俄罗斯教科院的模式。

俄罗斯联邦有个教育科学研究院，有一万多人，分几大块，包括编教材的，有出版社，还办报纸《教师报》，还培训干部。主体是研究机构，下面分很多研究所或研究室，教育学研究所、心理学研究所、儿童生理研究所、盲聋哑儿童研究室、营养研究室等等，一应俱全。

建院方案当时设想四大部：研究部，就以中央教科所筹备处为主成立研究部；教材部，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部，就是《人民教育》杂志社；培训部，就是教育行政学院。院长是副部级干部，由教育部一个副部长兼。是这么个架构。编制大概初步定350人，已经有这个方案了。所以到1960年教科所正式成立的时候，《人民教育》已经合并过来了。因为《人民教育》人少，比较单纯，他们原来就在教育部里办公，好合并，总编辑张凌光、章炼烽等人都已经到那儿上班了。

后来到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全国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建院方案报到中央文教小组，康生认为，这个时候全国都在精简，是不是要成立研究院，要研究。实际上就否定了。

康生是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当时的体制是这样，党内有几个小组，财经小组、外事小组、政法小组、文教小组，分管各条战线。<sup>①</sup>文教小组好像又比中宣部的级别高一点。这是党的系统，党的统一领导，对口是国务院，国务院有八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是财政经济办公室，第二办公室就是文教办公室，当时的主任是林枫。这种结构上下便于协调，互相之间也便于协调。

康生对教育干预比较多，插手的事情比较多。教育行政学院撤销，他来亲自讲的话。教科所虽然没有撤销，但成立研究院的计划也泡汤了。教科所筹备处保留了一部分人，从教育行政学院来了十几个人，这样凑成大概是24个人，还有一些是办公室行政人员，研究人员恐怕就不到20人，到1960年10月份正式成立了中央教科所。

教科所自成立筹备处到正式建所，办公地址换了几个地方，一直没有正式挂所牌子。记得康生给教科所写过牌子，是隶书变体字。怎么就请到康生写呢？原来教科所的办公室主任叫华炎，是个老干部。她的爱人叫彭加伦<sup>②</sup>，是个老红军，在长征途

<sup>①</sup>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明确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小组组长如下：财经小组为陈云，政法小组为彭真，外事小组为陈毅，科学小组为聂荣臻，文教小组为陆定一。

<sup>②</sup> 彭加伦（1906—1970），江西奉新人。1925年参加革命，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其间创作了大量长征作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中央教育部工农教育局局长。

中曾写过《飞夺泸定桥》一文，编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可能他和康生有交集，所以找康生写的。不知为什么，这个所牌一直没有正式挂过。

## “养士”和“六分之五”

记得1962年，周荣鑫<sup>①</sup>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教科所的所长。他到任不久，在教育部三楼会议室，把教科所的科研人员找去座谈，听取意见。在大家发表意见之后，他说，春秋战国时代有养士的做法，我们国家也应该养士，养你们这一批人。你们是知识分子，是科研人员，是为教育部出谋划策的。你们要多读书，查资料研究问题，教育部有什么事情，要决策什么的找你们咨询，从历史上看，从国外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训。至于现实的事教育部各司局去调查，你们也可以搞点调查，但是你们调查应该和教育部那个调查有所不同。教育部的政策研究是考虑眼前的事、现实的事，你们可以考虑比较长远的事。国家给你们这些编制，你们吃饱饭就是看书，查资料，下去跑跑做调查研究，也可以到中小学蹲点搞教改，不急于让你们马上拿出什么大成果。因为研究有个过程，不能急于求成，急于求成的东西肯定也是不会完善的。你们要经过深思熟虑，研究就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行，不要搞急就章。

他说：允许你们实行六分之五，不坐班。教科所那时候在教育部大楼办公，机关干部有意见，传达室也有意见。因为教育部八点钟上班了，你们研究人员怎么九点钟才来，十点钟才来，下午三点就走了。六分之五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周上班六天，保证五天搞研究工作，一天搞政治学习。这是聂荣臻在1961年以后，在“科学十四条”中，针对前几年搞政治运动，中科院的科研搞不下去了，在听取大家意见后向中央提出来的，即科学研究机关要实行六分之五，上班六天，政治学习什么只能占一天，要保证五天搞科研。<sup>②</sup>

中央教科所不是自然科学研究机构，要不要坚持六分之五，教育部很多机关干部有意见，怎么你们就不坐班？周荣鑫说，你们光看他们九点钟十点钟来的，他们晚上

<sup>①</sup> 周荣鑫（1917—1976），山东蓬莱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5年任国务院秘书长，1975年任教育部部长，次年受迫害致死。

<sup>②</sup> 1961年7月，聂荣臻领导科技界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其中第一条明确提出，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后来将之概括为“出成果，出人才”。第六条提出，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明确要保证科研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研究工作，规定把政治运动、政治学习、党团和工会活动、行政会议压缩在每周只占一天时间，强调行政干部能做好的事，不要叫科研人员做，业余时间让科研人员自由支配。

看书看到十二点，写材料，你们看到没有？他还说，你们行政人员下班一锁门就走了，人家可不是，人家下班晚上是要看书的，要写文章的。

周荣鑫针对教科所的现状，提出近期的任务主要是打好基础，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年轻人才。他说，毛主席强调读书，你们要好好读书，古今中外，你们都要学习，都要掌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样你们将来才能够给教育部出主意，想想办法。周荣鑫后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大家都很怀念他。

1960年刚合并成立所的时候，所领导认为要准备用半年到一年时间打好基础，进行基本功训练。那时候开了一个读书单子，又请了几大研究员讲课，讲怎么读书，怎么搞研究工作。这些老专家指导我们怎么写研究报告，哪里写得对，哪些论证不足。当时有个说法，意思是你就是教育科班出身的，也不是天然就可以做研究，也必须有基本功训练。我就很得益于这一年多的基本功训练，读了许多经典著作，收获良多。

1962年，由于教学改革的需要，所里成立了一个教学法组。当时调教育部小学司的专员、小学语文教育研究专家郭林来当这个组长，主持教学法组的工作。他当过延安保小校长，对小学语文颇有研究。后来又陆续调来一些同志，比如：李志平，他是北京宣武区（现与西城区合并）教育局副局长，在老区和新中国成立后都编过小学语文教材；雷克，北京市教材编审处研究数学教材的专家；还有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连健生，研究语文教学的专家。总之，陆陆续续调来四五个同志。当时提倡大家都去中小学听课。教育理论组的胡克英到宣武区香厂小学蹲点听课，研究课堂教学改革；心理组的伍棠棣到景山学校蹲点，参加景山学校的教改实验工作。我当时是理论组的，除了研究一些理论课题之外，也要到中小学去听课。我有幸在那个时候就认识了霍懋征<sup>①</sup>老师，她是北京实验二小的特级教师。我是经韩作黎<sup>②</sup>同志介绍，到实验二小去听霍老师课的，从此跟霍懋征老师交往了几十年。

## 再次酝酿成立教科院

1963年周荣鑫被任命为国务院秘书长，离开了教育部，戴伯韬出任教科所所长。那时候所的办公室仍在红星楼，戴伯韬经常到红星楼去，与有关人员开会，但不具体

<sup>①</sup> 霍懋征（1921—2010），山东济南人。1943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后改名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工作，全国首批特级教师之一。

<sup>②</sup> 韩作黎（1918—1998），河南邓州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视导司视导员、北京市教育局局长。